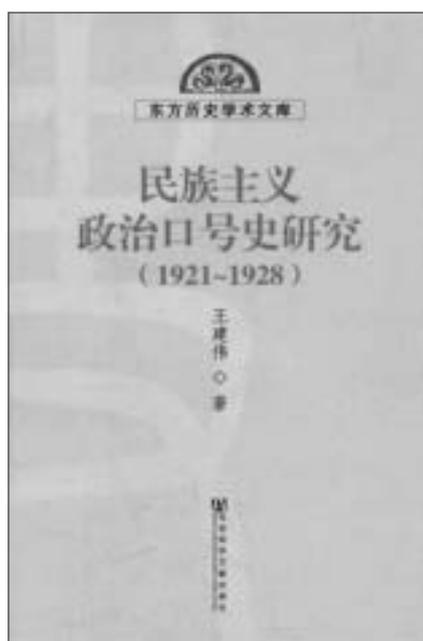


從「政治口號」到「口號政治」 ——《民族主義政治口號史研究 (1921-1928)》讀後

● 戴海斌



王建偉：《民族主義政治口號史研究(1921-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民國前期(1912-1928)，即「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在歷史書寫中一直處在尷尬的位置。或因國共兩黨皆奉孫中山領導的廣州政府為正朔，導致這一時期的「國家」與「權

力」遭受到最多的質疑，連帶對其政治、外交、經濟、文化諸領域的評價也整體趨向負面。不過，曾幾何時，北洋時期的歷史面相似乎悄然發生改變。2006年，陶菊隱的名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再版，編者特意指出，該書記載的那段歷史好比「理解現代中國政治的一把鑰匙」，聯袂薦書的多位文化人則強調其特色在於以「活潑潑的細節」和「現場感」取勝，頗能滿足今日讀者對於「大時代」的想像^①。近年來，文藝界也突然發現北洋時期「很有意思」，那種「華洋混雜、思想解放，包括剛脫離了封建統治時人的那種瘋狂興奮狀態」，成為電影創作(例如姜文導演的《讓子彈飛》〔2010〕)的靈感源泉^②。

儘管上述的評論可能只是各取所需，但民間觀感所見證的變化趨勢，一樣反映在專門的研究領域。1980年代起，多卷本《中華民國史》啟動編撰^③，已經預示新時期的歷史學家重新審視北洋時期歷史的勇氣和信心。約莫進入新世紀後，對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在歷史書寫中一直處在尷尬的位置。約莫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對北洋時代的歷史認知呈現出整體重建的態勢。「1920年代」被單獨提出來作為研討主題，相關研究領域不斷拓展，觀察視角愈趨多元。

在作者看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反赤化」等政治口號，是解釋1920年代中國政治格局的演變與時代特徵的重要線索與「關鍵詞」。作者力圖從動態的角度梳理它們的具體生成機制與傳播過程。

北洋時代的歷史認知呈現出整體重建的態勢。「1920年代」被單獨提出來作為研討主題，相關研究領域不斷拓展，觀察視角愈趨多元^④。近代中國「多歧互滲」（羅志田語）的特性在此時段表現最為充分，也漸成為一種共識。

《民族主義政治口號史研究（1921-1928）》（引用只註頁碼）一書的作者王建偉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現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書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增飾而成。王建偉選擇對1920年代的「政治口號」進行研究，同樣緣於為這段「光怪陸離、眾聲喧嘩」（〈序言〉，頁1）的歷史所吸引。他注意到那個時期國家不統一、輿論趨分裂的現實，「歷史的發展不是由任何單一勢力所主導的，沒有籠罩一切的力量，而是具有非常多元的景觀。」（頁27）歷史於此蘊藏的無限可能性，正是引人矚目的最大魅力所在。

除〈導論〉、〈結語〉部分外，全書凡九章：（一）五卅運動與1920年代國內政局；（二）1920年代「反帝」口號的提出及其演變脈絡；（三）1920年代關於「反帝」口號的論爭；（四）1920年代「打倒軍閥」口號的歷史遭際；（五）「反帝」與「廢除不平等條約」口號的邏輯關聯；（六）從「赤化」到「反赤化」：軍事戰場的正面交鋒；（七）師出有名：「赤化」與「反赤化」在思想戰場的觀念競爭；（八）社會輿論視野下的「赤化」與「反赤化」之爭；（九）1920年代中國的政治口號與口號政治。作者通過考察一系列政治口號的產生、運用和影響，特別是它們與具體政治事

件的互動過程，揭示出口號背後豐富的歷史意涵。

在作者看來，「打倒帝國主義」（「反帝」）、「打倒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廢約」）、「反赤化」等政治口號，是解釋1920年代中國政治格局的演變與時代特徵的重要線索與「關鍵詞」（〈序言〉，頁2）。作者並未將這些口號當做固定的概念，而是力圖從動態的角度梳理它們的具體生成機制與傳播過程（頁29）。借用瞿秋白的比喻，「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如果是一個活人，他的古典和歷史倒像一部很有趣的小說（頁19）。那麼，作者選擇這樣一個課題，不僅要有讀小說的趣味，還要有探索它「前世今生」的不一般的勁頭和耐心。

爆發於1925年的五卅運動拉開了現代中國民族自決運動的序幕，隨後在國共合作背景下進行的北伐戰爭則實現了中國最高政治權力的轉移。以後見之明，1920年代對於北洋軍閥來說，無異敲響喪鐘後的窮途末路，而對於國共兩黨來說，卻以「光榮的時代」、「革命的時代」標榜於史冊之中，意義全然不同。「反帝」和「打倒軍閥」這兩個口號，伴隨着北伐軍的凱歌前進被高調宣揚，並且穿越了時空，直到今天仍然為我們所耳熟能詳。本書的視野沒有局限在對這些口號所傳達的政治立場或民族主義情緒的簡單解讀上，而是致力於發掘其背後的歷史故事。

「反帝」是國共兩黨當時的共同主張，也是國民革命高舉的政治旗幟，但作者發現，對於甚麼是「帝國主義」以及如何反對帝國主義，兩黨遠未有一致的認識。在這中間

存在着「口號與行動」(黨的宣傳鼓動與國家政權現實能力之間存在落差)、「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國民黨較單純地抵抗外來侵略，共產黨在「反帝」同時還有捍衛蘇聯利益的一面)、「個別與整體」(國民黨主張區別對待，以英國為主要敵人，共產黨則要求將在華列強視為整體的帝國主義來打倒)三組突出的矛盾(頁148-83)，而且，國共兩黨自身所附着的深淺不一的蘇俄色彩及其與「反帝」之間的緊張關係，更是時人詬病的話題，尤其以國家主義者對此口號的質疑為最大。因為他們認為，蘇俄對中國一方面倡言對華親善，一方面實行侵略，既以金錢收買中國之無賴，又以軍隊參與中國之內爭，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頁185)。

該書的第二章對這一話題進行了詳盡的討論。在中共關於「反帝」思想理論體系的建構中，「反帝」是置於「打倒軍閥」這一目標之上的；國民黨雖然也高舉「反帝」旗幟，但從來都是將打倒軍閥、建立統一的國家作為第一目標，以收回租界和取締不平等條約為中心的「反帝」只能居其次。一旦落實到政治實踐層面，「反帝」口號常會出現種種變異。在北伐過程中，國民黨一直自覺地調整「反帝」策略，竭力避免與所謂的「帝國主義」發生正面衝突；即使在衝突發生之後，也盡量緩和雙方的關係。1928年5月3日發生的濟南事件就是顯著的一例(頁142)。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說，「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甚麼和實際是怎樣一

個人。」^⑥若移用此語以觀察某政黨或政權，看來也是同樣適用的。

另一方面，孫中山雖然亮出了「打倒軍閥」的旗號，但在當時輿論界及許多知識份子眼中，孫與其他軍閥基本沒有多大區別，孫常被視為南方的「軍閥」。國民黨改組以及在國民革命軍中引入「黨代表制」，就是為了「造出一班黨化的、主義化的軍人」，即所謂「政黨領軍」、「主義治軍」，這被作者視為國民黨人為區分自身與軍閥所作的現實努力，亦即「打倒軍閥」口號另一種意義上的政治實踐(頁244)。

北伐初始之際，「黨軍」發揮出巨大的威力，然而，隨着進程的深入，敵我之間的區分轉而模糊，國民黨自身的工作不能及時跟進，「黨軍」迅速「軍閥化」。國共合作破裂後，中共迅即指認國民黨為「新軍閥」；而在國民黨內，胡漢民也同樣批評蔣介石為「新軍閥」(頁242)。王奇生在其《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一書中，對國民黨性質有一個著名的判斷——「弱勢獨裁政權」，認為由於蔣介石重軍輕黨的主導思想，造成國民黨黨治體制名義上以黨治政、以黨治軍，實際上是以軍統政、以軍控黨^⑦。本書作者同樣注意到，「舊軍閥」被打倒後，「新軍閥」隨之而起，國民黨「政黨領軍」與「主義治軍」的建軍目標逐步被「以軍控黨」、「武主文從」所取代(頁243-44)。正是這一現實，消解了「打倒軍閥」口號的有效性。

至於「廢約」口號與「反帝」口號幾乎可以說是同根孿生。當時主流輿論將「不平等條約」視為帝國主義控

作者注意到，「舊軍閥」被打倒後，「新軍閥」隨之而起，國民黨的「政黨領軍」與「主義治軍」建軍目標逐步被「以軍控黨」、「武主文從」所取代。正是這一現實，消解了「打倒軍閥」口號的有效性。

既往關於北伐前後這段歷史的研究，多以南方國民革命軍為中心，較少注意北洋軍閥的表現。作者力圖超越革命時代所造成的激越的批判語境，將勝敗雙方置於同等的位置來論述。

制中國的工具，將二者的關係比喻為「唇齒相依、皮毛相附」（頁269）。在特定時代語境下，幾乎所有與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國家都被視為帝國主義。「廢約」口號迅速興起，使得「帝國主義」的形象變得前所未有地清晰，也使得「反帝」有了具體可觸的目標。本書關於「廢約」口號的研究，可與最近譯介過來的美國華裔學者王棟的一部著作《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國耻與民族歷史敘述》(*China's Unequal Treaties: Narrating National History*) 對照。王棟歸納了「不平等條約」的三種解釋模式，即道德模式(moral interpretation)、法律模式(legal interpretation)、宣傳模式(rhetorical interpretation)，其着力揭示的是以國共兩黨為代表的近代政黨，通過對不平等條約歷史的「不斷定義」和「不斷敘述」，從而確立自身的權威與合法性，無疑屬於最後一種解釋模式⑦。

本書主要關心的問題同樣非條約本身，而是國人對條約的認知和敘述，從這一點看，與王著的旨趣相當接近。不過，作者沒有太多糾纏於「不平等條約」這一概念的語義和修辭方法，也沒有刻意將它作為一個「帶有某種象徵意義的符號」⑧來處理，而是平實、細緻地考察了「不平等條約」概念的形，以及不同社會群體(包括各政治力量、輿論界、專業學術領域)對它的解釋和運用，同時梳理了「修約」與「廢約」口號之間的競爭關係。書中特別指出，對「不平等條約」的研究與「廢約」口號的提出，實際形成了一個「逆向的過程」(頁270-71)。這是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察，值得進一步深入研討。

如作者所言，「廢約」是揭示近代中外關係的關鍵詞，「廢約」口號迎合了當時社會激進的情緒——長期困擾國人的問題在此找到了簡單直接的答案。不過，現實中的「廢約」並不是那麼簡單。在近代外交史敘事中，「革命外交」一直是作為絕對主角登場的，而北洋政府等於脫離民眾的「軍閥傀儡」、毫無外交成果可言的見解也代表了過去學界的主流看法。近年來學界開始出現重視「修約外交」的傾向，對北洋政府時期取得的外交業績評價相當不俗⑨。有海外學者甚而指出，以改訂條約為特徵的中國近代外交並非北京所獨有，廣州政府亦然，後者所標榜的「革命外交」，儘管加入了新穎而富動員力的要素，但究其實質內容，與前者並無多大的不同⑩。

本書對「修約」與「廢約」實踐的「南北互動」也有專門的考察，作者發現：北伐之前，由於廣州國民政府並非各國承認的、可以代表中國主權的中央政府，因此國共兩黨的「廢約」主張並不能落到實處。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蔣介石發表的宣言表明，有關處理不平等條約的外交方針逐漸與北洋政府的「修約」目標接近。至1928年6月，北伐大業底定，南京政府基本摒棄了「廢約」口號而代之以「修約」方針。總體而言，從五卅到北伐這段時期，「革命外交」的成果極其有限，其意義只是「在特定的時期提供了一種(對待不平等條約的)特定的方式」而已(頁287-90)。

既往關於北伐前後這段歷史的研究，多以南方國民革命軍為中心，而較少注意以直、奉等為主要代表的北洋軍閥的表現；尤其是除軍事行動之外的其他方面更被忽視。對這種因「優勝劣敗」進化史觀而造成的研究局限，作者深有意識，而「力圖超越革命時代所造成的激越的批判語境，嘗試將勝敗雙方都納入到一個論述體系中來，將雙方置於同等的位置」（頁26）。這一努力在本書中的具體表現，即在於對「赤化」和「反赤化」這一組口號的梳理。

本書第六、七、八章分別討論「赤化」的國民革命軍與「反赤化」的直、奉軍閥在軍事戰場上的正面對抗，中共、國家主義者及章太炎等圍繞「赤化」和「反赤化」的思想論爭，以及社會輿論對這場論戰的持續關注。這三個部分取材各異，而指向問題則只有一個，最宜合而觀之。相對而言，較之「反帝」、「廢約」、「打倒軍閥」這些口號，今人對「赤化」和「反赤化」的感受可能最為陌生。本書對這一問題有較為詳盡的研究，可以說是學術貢獻最多的部分。「反赤化」有一個從言論口號逐漸轉向具體軍事政治行動的過程。從國民黨改組時期開始，社會上開始出現指責其「赤化」的言論；五卅時期，「反赤化」輿論開始在社會上發生影響；直到1925年底，「反赤化」口號被應用於軍事行動（頁340）。作者很敏銳地捕捉到，從「反赤化」口號的流行程度，可以判斷當時的民心並非全在南方的國共兩黨；軍閥爭相使用「反赤化」口號為其軍事行動正名，而國民黨方

面也積極闢謠，並有意識地與中共保持距離，恰從側面反映社會輿論對「赤化」的負面觀感（頁300）。

就「赤化」和「反赤化」口號的使用情況而論，也都有相當大的隨意性。在中共看來，「『反赤』變成了一切反動勢力向民眾進攻的最時髦的名詞」（頁356），其主子是帝國主義，工具則為反動的軍閥（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李景林、陳炯明等），以及反動的知識階級（研究系、國際主義派以及老民黨反動份子，如徐紹楨、章太炎、馮自由等）。另一方面，直、奉軍閥也將「赤化」範圍愈推愈廣。從前此頭銜只是為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所有，現在工會、學生會、農民運動領袖、國民軍，以及郭松齡、虞洽卿，甚至段祺瑞治下的賈德耀內閣，也算在「赤化」之列（頁356-57）。

比較有意思的是，「反赤化」口號剛興起的時候，共產黨限於自身力量，並沒有引起北方軍閥及主流社會輿論的足夠重視，時人認知中的「反赤化」對象，更多地指向了「北赤」馮玉祥與「南赤」蔣介石，後者甚至被視為「赤魁」。1927年國民黨開始清黨後，共產黨才成為「反赤化」的最大目標（頁340）。可見，「反赤化」主要是一面旗幟，一種「名義」。雖然多數人對「赤化」的真正含義所知甚少，但並不影響對此口號的任意使用。

不過，對口號運用者的性質，作者還是有所梳理的。他認為國共兩黨具有理論宣傳的明顯優勢，而直、奉軍閥則在「反赤化」口號的理論體系建構上缺少建樹。當時中共真正的辯論對手是以章太炎為首的

「赤化」和「反赤化」口號的使用有相當大的隨意性。不過，對口號運用者的性質，作者還是有所梳理的。他認為國共兩黨具有理論宣傳的明顯優勢，而直、奉軍閥則在「反赤化」口號的理論體系建構上缺少建樹。



有「北赤」之稱的馮玉祥

在1920年代的中國，口號實為權力爭奪的輔助手段，在南北雙方的不斷建構下，不斷超越本身應有之意而具有了一種「魔力」。作者指出，過份強調北伐勝利中「宣傳」的效果乃是一種歷史迷思。但口號的「魔力」仍為今人所感應。

一批人，以及以曾琦為代表的國家主義團體，後者的「反赤化」言論更多源於與中共政治理念的根本衝突，是基於一種學理上對「赤」的排拒，這點與軍閥勢力借助「反赤化」作為政治旗號的行為根本不同（頁378）。從他們發表的「討赤」宣言中充斥「仁義」、「廉恥」、「孝悌」、「倫常」等充滿濃厚道義色彩的詞彙可見，北洋軍閥對「反赤化」口號沒有形成哪怕是粗淺的理論體系。作者很遺憾地指出，他們「大多出身草莽」、「在掌握思想動態方面相當欠缺」、「與當時社會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漸行漸遠」（頁362）。

這讓筆者想起何兆武口述自傳裏的一個說法，他回憶在北洋時期當童子軍的經歷，軍歌裏唱「二十世紀天演界」、「不競爭，安能存」，這不過是清末《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那一套；對比北洋和國民黨兩個政府，他印象最深的是：「國民黨有意識形態的灌輸，開口三民主義，閉口三民主義，但

在這之前完全不是這樣，北洋政府沒有意識形態的統治，這是和國民黨時期最大的一點不同。」^⑩由縱向的歷史視野來看，北洋政府上承清朝，下啟整個二十世紀，它明顯還是一個不太擅長組織、宣傳、動員的政權，不太擅長意識形態作業，從此意義上講尚難脫十九世紀性質的政權的色彩。正如陳志讓所指出的，「軍閥因襲了清末保守派文化的傳統」，其所代表的保存舊秩序的思潮與激進知識份子代表的建立新秩序的思潮之間，形成了尖銳對立^⑪。

北洋政權在理論宣傳、國民動員方面表現出來的笨拙和低效，已經不適應民族主義興盛的時代，而這些政治要素恰為後來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所共有。可以說，北洋政權更多沿用了形同清朝的文化統治方式，而與同屬於「中華民國」序列的南京國民政府之間，反而呈現出承繼關係的明顯斷裂。何兆武還曾說：「這前後兩個政府的統治有很大不同，至少在我的感受上是這樣，不過這一點，好像寫當代歷史的人都沒有足夠地強調。」^⑫本書通過對「赤化」和「反赤化」口號的研究，其實打開了觀察這種「不同」的一個窗口，足以啟發我們繼續思考。

至於「反帝」與「反赤化」雖然以一種對立的姿態出現在時人視野當中，但在它們身上，作者發現了許多相反相成的東西。二者的實際指向都是當時的外部勢力，不管是前者涉及的英、美、日等國家，還是後者所特指的蘇俄，都因對中國事務的介入而成為被反對的主要目標。它們的原始出發點，都來自強

烈的民族主義意識。這兩個相互對立的口號背後實際上隱含着相同的理論邏輯，即1920年代中國強大的民族主義浪潮（頁406-407）。無怪乎本書標題在「政治口號史」之上，要加以「民族主義」的前綴。

同時，在激進的時代語境中，政治口號所特有的局限性也有明顯體現。兩個口號都是以「反」字加上帶有形容詞性質的名詞組成，具有鮮明的指向性，同時也隱藏着火藥味，是一種帶有暴力性質的口號（頁455）。對於國共兩黨與直、奉等軍閥而言，他們所高舉的「反帝」與「反赤化」旗幟，一方面源於各自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更多地是對這些口號的策略性運用。在1920年代的中國，口號實為權力爭奪的輔助手段，在南北雙方的不斷建構下，不斷超越本身應有之意而具有了一種「魔力」。作者已意識到「口號政治」的限度，指出過份強調北伐勝利中「宣傳」的效果乃是一種歷史迷思（頁452）。但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遺產之一，口號的「魔力」仍無時不刻不為今天的人們所感應。

通讀本書後的印象是，這是一部視野開闊、論證詳明的好書。作者師從龔書鐸習思想文化史，學有本源，而語多行話，本書堪謂嚴謹專業訓練產出的優品。在史料利用上，檔案、文集、日記、書信、報紙期刊兼收並蓄，而其中以報刊為最大宗。作者對言論材料的使用，有着很強的方法論自覺，強調辨析文本產生的特定背景及寫作意圖，而非簡單將其當成必然支持本書論點的史料；除分析社論文字之外，

本書還留心報紙、報社、報人之間的關係，從報社立場、報人風格等方面綜合考察報上文字的社會意義（頁28-30）。又如前所提及的，本書非常注意擺脫後來勝利者一方對歷史書寫的選擇性，強調「平心」對待爭論各方的言論與觀念，給各方以盡可能均等的「發言權」，從而盡可能將各種口號還原到當時的歷史處境中。

而且，作者的學術抱負尚不止於此，他在〈導論〉中還示意「在一定限度上」嘗試使用「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頁29）。對於本書涉及的政治口號，「不僅將其視為一種情緒的宣洩與表達，或者主義的標榜，同時，還將其直接視為一種連接心態、思想，並貫通政治、軍事和文化諸領域的主體社會化『實踐』；不僅關注口號的生成與傳播的過程，還特別關注受眾對此的接受與回應」（頁30）。細繹寫作實踐的文本，上述方法論的貫徹可以說是相當徹底，但我們並看不到有甚麼醒目的理論術語或框架貫穿全書的論述。

就筆者的閱讀感受而言，《民族主義政治口號史研究（1921-1928）》一書確未單純地就口號論口號，而是努力呈現「政治口號」台前幕後的歷史，這勢必需要將政治史、思想史、社會史結合起來討論。乍看本書標題，其實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概念、符號、象徵、傳播、想像種種（這樣的「窄化」聯想當然並非作者故意為之），而事實上，這裏的「史」，已不止包含思想文化史一個面向，而帶有濃厚的「綜合」性質。與其說本書研究的是「政治口號」，

本書確未單純地就口號論口號，而是努力呈現「政治口號」台前幕後的歷史，這勢必需要將政治史、思想史、社會史結合起來討論。與其說本書研究的是「政治口號」，毋寧說是「口號政治」。

「學術史梳理」是目前所有國內出版的學術著作的「規定動作」，但能做到胸有成竹、言之有物者卻不多覩，本書這部分寫得扼要而且周到，有「述」有「評」，對於將讀者帶入相關學術語境極有幫助。

毋寧說是「口號政治」。這樣一種寫作取向，與「新文化史」的旨趣或有所暗合，但已經難以被它完全涵蓋。對於「未能在口號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方面有令人滿意的表述」，作者表示了「遺憾」（〈序言〉，頁2）。在寫作者而言，「見之於行事」或為無奈的一種選擇；作為「受眾」之一的筆者，卻未必不能接受，甚至以為上佳。如此相異的取捨，置諸閱讀史大概也不算是可怪的現象吧。當然，以作者的學術才華，俟完善精準的理論表述於來日，無疑是值得期待的。

最後，再簡單提兩點本書的優長處。「學術史梳理」是目前所有國內出版的學術著作的「規定動作」，但能做到胸有成竹、言之有物者卻不多覩，本書這部分寫得扼要而且周到，有「述」有「評」，對於將讀者帶入相關學術語境極有幫助，此其一。其二，作者文字清通，議論明快，開篇以「五卅運動」為引子烘托出時代氛圍，最後以「口號政治」滲入二十世紀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收束，一頭一尾的處理尤具畫面感。全書讀來少有一般史著的艱澀、枯燥，整體感覺相當愉快。

註釋

- ①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封底及腰封薦語。
- ② 李宏宇：〈姜氏北洋片：有中國特色的美式西部片〉，《南方周末》，2010年12月9日。
- ③ 李新等主編的多卷本《中華民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

2011），分《中華民國史》、《中華民國史人物傳》和《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三部，總計三十六冊。

④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海外學界對1920年代的關注，其實更早。參見狹間直樹編：《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國》（東京：汲古書院，1995）；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2）。

⑤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579。

⑥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359。

⑦⑧ 王棟著，王棟、龔志偉譯：《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國恥與民族歷史敘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85-87；72。

⑨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⑩ 川島真：《中國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頁348。

⑪⑬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上學記》（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5；10。

⑫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160-69。

戴海斌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